

歷久彌新的生命探照燈

● 羅家倫原著

一九九六年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前中央大學校長、國史館長羅家倫先生百歲冥誕，中央大學、故宮博物院、國史館等單位舉辦多種活動紀念這位中國文史哲學門中最傑出的學者教育家。羅先生五十多年前所著「新人生觀」一書在今天讀來，仍覺歷久彌新，發人深省，他開闊的胸襟，廣博的學識，優美的文辭，給年輕人許多叮嚀和期許，令人有醍醐灌頂之感，最富教育意義，值得細讀。匯森曾選錄羅先生四十五年前自費重印「新人生觀」書中：「建立新人生觀」及「學問與知識」兩篇，交中大校友通訊雜誌刊登惟印發數量不多，迄今仍有許多朋友未能讀到，紛紛來函索閱，特再商請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兄在中外雜誌重刊，以供國內外青年朋友研讀，是所企盼。

朱匯森謹識

壹、建立新人生觀

建立新的人生哲學

建立新人生觀，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學。他是對於人生意義的觀察，生命價值的探討，要深入的透視人生的內涵，遙遠的籠罩人生的全景。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生在世上有什麼價值？我們如何能得到富有意義和價值的生命？我們的前途又是怎樣？這些不斷的和類似的問題，我們今天想不到，明天不定會想到；一個月想不到一次，一年不定會想到一次；在紅塵滾滾，頭昏腦脹的時候縱然想不到；但正值曉風殘月，清明在躬的時候，不定也會想到。想到而不能作合理的解答，便是面臨人生極大的危機。若果有永遠想不到的人，那真不愧為醉生夢死，虛度一生的糊塗蟲了。想到而又能運用智慧，以求解答，那他已踏進了人生哲學的範圍。我們本來先有人生後有人生哲學，正如先有飲食而後有營養學。但是既有了人生哲學來幫我們探討，和解答這些與生命不可分離的

問題，我們為什麼不研究？何況這種探討和解答，曾經透過了多少先哲的腦汁與心靈，是他們智慧的結晶，我們更為什麼不研究？

「牧童呵！你有不有哲學？」這是西洋自古流傳的一句問話。是的，牧童何曾不可有哲學，更可能有他的人生哲學，若是我們採取哲姆士（William James）寬大的胸襟，認為哲學乃是一種人生的態度。可是態度有正的、有偏的、有健全的、有不健全的，有經得起理智和經驗考驗的，有經不起理智和經驗考驗的。

不但人生的苦樂，在此分路，即人生的有價值和無價值，也在此分路。所以人生哲學的研究，愈加不可忽略。鄉間的老農老圃常常要尋求，而且常常能把握住一兩句先民的遺訓，父老的名言，以為一生做人處世的準則，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正是他生命合理的要求。何況知識與理智發展到相當高度，而又急切要追究人生意義的人們，尤其是青年？

確定方向人生有據

在現時代，人生哲學更有他重要的意義和使命。因為在這時代，舊道德標準都已動搖，而新的道德標準尚未確立，一般青年都覺得徬徨，都覺得迷惑，往往進退失據，而陷於煩悶和苦惱的深淵。在中國有此情形，在西洋也是一樣。

西方國家從前靠宗教以給人們內心的安寧，以維持社會善良的秩序，到現在則舊的宗教信仰已經動搖，而新的信仰中心還未樹立，在這青黃不接的時代，更現出許多迷路羔羊。讀李勃曼 (Walter Lippmann) 道德序言 (Preface to Morals) 一書，便知中外都有同感。因此在這個時代，更有重新估定生命的價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學之必要；否則長久在煩悶苦惱之中，情緒日漸萎縮，意志日漸頹唐，生活自然也日漸低落。結果青年們的心理中第一步是動搖，第二步是追求，第三步便是幻滅：這是何等悲慘的狀態！有知識責任的人，對於這種為「生民立命」的工作，能夠袖手旁觀嗎？

要建立新的人生哲學，首先要明白他與舊的人生哲學，在態度上至少有三種不同。以這不同的態度，才能重行估定新的生命價值表。

首先要認定的是新的人生哲學不是專講「應該」(ought)，而是要講「不行」(cannot)，舊的人生哲學常以為一切道德的

標準，都是先天的範疇，人生祇應該填塞進去。新的人生哲學則不持先天範疇之說，而祇認為這是事實需要，經驗的結晶，經過思考後的判斷。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較空，不成，要得要不得的問題更切。拏文法的定律來做譬喻，本不是先有文法而後有文字，文法祇是從文字歸納出來的。文法的定律並不要逼人去遵守他，但是你如果不遵守他，你就不能表白意思，使人了解。你自己用文字來達意表情的目的，竟由你自己因此而打消。所以這是不成的，就是要不得的，也就是所謂「不行」的。

從知識中尋求真義

其次，新的人生哲學不專恃權威 (authority) 或傳統 (tradition)，乃要以理智來審察現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條件。權威和傳統並不是都要不得，祇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我們要以理智和經驗去審察他，看他合於現代生命的願望、目的以及求生的動機與否。這不是抹煞舊的，而是要重新審定舊的、解釋舊的。舊的是歷史，歷史是潛伏在每人的生命意識之內，不但不能抹煞，而且想丟也是丟不掉的；但是生命之流前進了，每個時間階段都有他的特質。鎔鑄過去，使他成為活動的過去，為新生命中的一部分，才能適宜並提高現在生存的要求。

還有一層，新的人生哲學不講「明心見性」之學，更不涉性善性惡之論。他是主張

整個人生及其性格與風度的養成，從知識中探討生命的奧秘，並從經驗與習慣中培養理想的生活。他否認先天的原始的罪惡，他也不憑藉直覺來判斷是非，他不知什麼叫「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自然他更不懂得什麼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的禪理。他不把行為的標準建立在冥思幻想上面，同時也不把他建立在衝動慾望上面。他要從民族和人類的歷史和文化裏，尋出人與人相處，人與自然相與的關係，以決定個人所應該養成的性格和風度。他是要從個人高尚生命的現實中，去增進整個的社會生活與人類幸福。覺得如此，方不落空。

新的人生哲學，祇是根據這三種態度以重定生命的價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觀。他並不否認舊的一切價值，有時不過加以必要的改變與修正。他把舊的價值，重新估計以後，仍然編入新的價值標準表內，以求其更有意義的實現，更豐富和圓滿的實現。這才是真正的「價值的轉格」(die Umwertung aller Werte)。

我們不祇是求人生更豐富更圓滿的實現，我們還要把人生提高。平庸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們要運用我們的生力，朝著我們的理想，不但使我們的生命格外的崇高偉大，莊嚴壯麗，而且要以我們的生命來領導，帶起一般的人，使他們的生命也格外的崇高偉大，莊嚴壯麗。因此我們要根據新的人生哲學態度，建立三種新的人生觀。

智慧判斷不致盲動

第一是動的人生觀。宇宙是動的，是進行不息的；人在宇宙之間，自然也是在動的，進行不息的。希臘哲學家海瑞克萊圖斯（Heracleus）說：「你不能兩次站在同一條河裏。」孔子在川上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都是解釋這個道理。何況近代物理學家更告訴我們，不特天空星球在運行，即在原子的內部，每個電子都繞著原子核不斷的在轉呢！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裏，把人生的動的方面，束縛太多了。尤其是宋儒偏重「主靜主敬」的學說，把活潑潑的一個人，弄得動彈不得。顏習齋把真正孔子主持的禮、樂、射、御、書、數的教育，和宋儒錢冠博帶對談靜敬的教育，形容成爲一幅慌目驚心，絕對相反的圖畫。他慨然道：「……：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界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顏習齋存學編性理評。）這番話真是力行的精義！在今天的時勢，尤其可以發人深省。其實若于宋儒的學說，已經被滲入某種印度哲學的成分，和孔、墨力行的主旨，早已違背了。

我們要提倡動的人生觀，可是同時得充分注意到動之中有兩種不同的動：一是有意識的動，一是無意識的動。有意識的動是主動、自動。無意識的動是「機械的動」，也是被動、盲動。自然界許多動的現象，都是屬於後者，如行星繞日，循著軌道，千百年不差分毫，就是一例。若干動物的行動，何獨不然？你不見燈蛾撲火，駝鳥鑽沙嗎？其實有些人的行動，也不會倖免。譬如衝動，往往由於來了某種刺激，使神經或血液循環系統起了某種反應和變化，來不及考慮思索，驟然發出某種急劇的行動，這還不是生理上的機械的動嗎？這種的動在本質上不但無意識而且無意義。幸而人的行動，決不都是如此，這一隅並不能以喻全局，否則全部的歷史，都是機械的、盲目的、無意義的了。人是有意識的、有靈感的、有智慧的，所以他有思想的自由，有選擇的自由，他可以憑他的判斷來指揮他的動態。人生值得一活，世事值得努力，歷史值得創造，正是爲此。（詳細的理論，見悲觀與樂觀及扭開命定論與機械論的鎖鍊兩章。）那把人生和歷史硬看做機器上的齒輪一樣，按照他們假想的公式，認爲祇是不能不動而動的說法，不但是妄自菲薄，而且是誣蔑人類。

大我人生觀的真義

第二是創造的人生觀。我們要動，而我們的動並不是機械的，乃是有意識的，也就

是可以憑意識來指揮的，那我們就應當把我們的動力，發揮到創造性的事業方面去。我們不祇是憑自力創造，而且要運用自力，以發動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來創造。我們不僅僅要驅使無限的電力爲人類服務，我想不久的將來，更能解放宇宙間無限的原子能，成爲被管制的動力，以爲人類的幸福，另闢一個新紀元。這就要靠創造的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了。人類之有今日，是歷代先哲創造的智力所積成的。我們不能發揮創造的智力，不但對不起自己的人生，而且對不起先哲心血積成的遺留。保守成功嗎？保守就是消耗、衰落、停滯、腐爛與毀滅。舉例來說，前代的文化創造品，是有偉大的、特出的。設如你不把他吸收孕育，再來努力創造，而專門保存舊的，那不僅舊的不能成爲新人生的一部分（我們至多不過享受而已），而且新的偉大的文化作品永遠不會出來。何況那偉大的創作，永久是前人的創作，前時代的創作，有限的創作，而不是本人的創作，現時代的創作，無限的創作。我們不但要「繼往」，更加要「開來」！

第三是大我的人生觀。我們不要看得人太小了、太窄了。太小太窄的人生是發揮不出來的。他一定像沒有雨露的花苞，不但開不出來，而且一定萎落，一定殞死。我們所以有現在，是多少人的汗心血培植成的。就物質而言，則我們吃的、穿的、走的、住的，那一件不是農夫、工人、商人、工程師

、發明家這一般廣大的人群所貢獻？就精神的糧食而言，那一項偉大崇高的哲學思想，美麗諧和的音樂美術，心動神移的文學作品，透關忠誠的歷史記載；凡是涵煦覆育著我們心靈生活的，不是哲人傑士的遺留？我們負於大社會的債務太多了。祇有憑著他們方能充實形成小我。反過來也祇有極力發揮小我，擴充小我，才能實現大我，為小我而生存。這生存太無光輝、太無興趣、太無意義。必須小我與大我合而為一，才能領會到生存的意義。必須將小我來提高大我，推進大我，人群纔能向上；不然小我也不過是洪流巨浸中的一個小小水泡，還有什麼價值？這就是大我人生觀的真義！

藉生活實現人生觀

人生觀不是空虛，是要藉生活來實現的。不是身體力行，斷不能領會到這種人生觀的意味，維持他的崇高。所以要實現這三個基本的人生觀，必要靠以下三種的生活方式。

第一是生力飽滿的生活。生命的存在，固然要靠生力(vitality)，生命的發展尤其要靠生力。生力是生命裏面蘊藏著的無限生機，把生命不斷向上向外推進和擴大的動力。他雖是一粒小小的種子，卻可以長成參天拂雲的大樹；他雖是一架壁爐裏的爐火，卻可以吸收很高很遠的空氣中的養氣，使其發光發熱，滿室生春。他使人生不停頓、不板

滯、不腐蝕，能活潑、能進取、能發揚。有生力的人生是朝氣勃勃的，無生力的人生是氣息奄奄的。在這兩種人生的十字路口，你願意選擇那種？生力固常因愈發揮而愈增加；但有定向的人生卻也應當將其培養和儲蓄，不讓他隨意發洩，以備他積成雄厚的力量，寫出更有意義的人生。

第二是意志的生活。在這沉迷淪陷於物質生活的人群中，有幾人能實行意志的生活？能領會這種生活的樂趣？不說超人，恐怕要等那特立獨行的人罷！非是堅苦卓絕的人，怎配過意志的生活？因為這生活不是肉感的、享受的。生命的擴大，哪能不受障礙，障礙就是意志的試驗。意志薄弱的見了困難就逃了。祇有意志堅強的人纔能運用生力征服過去。經過痛苦是常事。祇有痛苦以後的甜蜜，才是真有興趣的甜蜜。但是平庸的人能了解嗎？意志堅強的人絕對不怕毀滅，而且自己能夠毀滅，毀滅以後，自己更能有偉大的創造，所以戰爭是意志的試金石。我常論戰爭說：開戰以前計較的是利害的輕重，開戰以後計較的是意志的強弱。這就是勝負的關鍵！不但是有形的軍隊戰爭如此，一切生存的戰爭也是如此。平庸的、退卻的、失敗的鎖鍊，祇有堅強的意志纔能扭開。

第三是強者的生活。能憑藉意志去運用生力以征服困難的生活，非強者的生活而何？我所謂強，是「強而不暴」的強，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強。強的對面是弱

。搖尾乞憐，自己認為不行，便是弱者的象徵。強者的象徵就是能在危險中過生活。他不但怕危險，而且樂於接受危險。他知道戰爭是不能躲避的，所以歡樂的高歌而上戰場。他的道德信條是強健、勇猛、無畏、正直、威嚴、心胸廣大、精神奮發。他最鄙視的是軟弱、柔靡、恐懼、倚賴、狹小、欺騙、無恥。他因為樂於危險的生活，所以他不求安全。古人說「磐石之安」，但是磐石不是有生命的。無生命的生活，過一萬年有什麼意思？況且求安全是不可能的事。安全由於平衡，生命那有固定的平衡？因為你發展，人家也發展，祇有以你自己的發展，來均衡人家的發展，才能過得比較安全。若能如此，才能操之在我。所以他永遠是主人，不是奴隸。

崇高理想人生指標

以上三種生活方式，乃是真正有意義的人生的基礎。但是這三種生活方式，必須要連貫起來，好好的調劑和運用，方能達到完善理想的人生。說到此地，我們不能不更進一步，去認識三個精瑩而又偉大的力量了。

(一)理想：理想(Ideal)是人類對於宇宙和人生所能想像得到的完善的意境。他尤其是人生的啓示，也就是懸在人生前面的燈火，照耀在人生努力的過程上的光明。他不是空想，更不是幻想，因為他的產生是由精關的思維和偉大的智慧磨盪孕育而來，並且是

曾經嚴格的理則的考驗，和豐富的經驗的體會過的。人生最容易困頓在現實的滯滯中間，不能振拔，是很危險的事。權審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就是沉淪在現實裏面可怕的心理。但是尤其可怕的是近年來青年心理中的所謂「現實主義」。

共產黨以不擇手段的方式，利用青年求得一時滿足的心理弱點，到處鼓動一種「現實主義」。弄到青年不顧宿舍裏共同的幸福，一轉眼就把木床劈來燒開水；不顧實驗材料的極度困難，而把實驗室的酒精燈點來煮雞蛋；甚至於燒到教室裏的桌凳而弄到大家站著聽講！把求知的工具毀了，入學的目的丟了，祇為了一時的快意和滿足！那些遺害青年的毒辣煽動，造成這樣可怕的變態心理！這種變態心理的蔓延，最後到了一般的社會，造成一種所謂「吃光運動」！當民國三十七八年間，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帶；許多人如瘋如狂的把儲蓄著可吃的東西吃了不算，還把可賣的東西賣了，由甲地坐火車到乙地，盡量的享受一下。享受過後，並不能「壽終正寢」，於是再來嘆氣和怨恨。共產黨企圖顛覆政府，破壞後方的目的是達到了，可是被鼓動到如飲狂泉的人們，卻是封鎖在鐵幕後面過饑餓和奴役的生活了！至於在社會道德上所留的餘毒，更是難於估計。受到這種惡果之後，我們還能不覺悟嗎？我們要恢復人性，提高人生，不能不有理想。我們要建設國家，重定世界秩序，更不能不有理想。

理想是我們的遠景，也就是使我們興奮而努力的目標。理想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舒展的，所以最後的理想總是不能達到；可是正是因為如此，人生的繼續，才更有意味。

修持智慧涵養人格

(一) 智慧：智慧 (wisdom) 是人生的透視，是一種微妙的領悟，同時也是這領悟的結晶。他能籠罩和體會著理性和經驗，而從這中間悟到某項的真理。智慧與智力很難嚴格的劃分。智慧常常憑藉智力做基礎，可是到某一階段，或某種關係上，他能別有會心。他的效能的發揮，往往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所以歷代哲人遺留下來的智慧，也常常是

人生哲學裏的珍藏。拏當前問題來作譬喻，製造原子彈是要靠高度的智力，而如何運用原子彈，則需要很大的智慧。在兩軍相戰的時候，可充分運用智力以取得勝利；但是勝利以後，如何可以運用戰利的成果，來調整各種國家民族間的關係，以建立世界新的秩序，長期的和平，卻更需要很大的智慧。在人事的，尤其是有歷史性的重大決定中，有無智慧的成分，關係極為重大，因為許多後果，祇有歷史才能證明。智慧在歷史上發生的影響尚且如此，在個人一生生命過程中的重要抉擇上，何獨不然？

(二) 人格：人格是衡量個人一生生命價值的標準，是某一個人之所以異於他人的特徵，也就是某一個人生命連續的維持力，尤其

是他道德的生命。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形成，全靠人與人間的信任。信任的基礎在於彼此間最低限度的人格認識。飄忽無定，變化莫測的生活形態，祇見之於小說裏的鬼狐，而不當以此衡量人類。搖身一變，朝秦暮楚的人，決不能說是有資格。人之所以為人，就祇靠肉體，僅認軀殼嗎？那麼，生理學家和化學家可以坦白的告訴你，你的全身祇不過是若干氫、氧、炭、鈣等等原子所組成；他們更化身為無數的細胞，這細胞每天的新陳代謝，又以千百萬的單位來計算；一死之後，則整個軀體，又大大的解放，還到氫、氧、炭、鈣等等原子的原形。這樣說來，人固不成人，我也不成我，那還要講什麼做人，更何需什麼人的努力？這是唯物史觀必有的結論，這也是十九世紀後期許多人祇看見物質科學發達，而受震炫後所得到的感覺。就是梁任公初聞此說，也受震炫，遂有「不惜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的言論。那

知道人生並不是這樣片面的、慘酷的、無意義的。人的組合不是片面的，所以肉體之外，還有心靈；形貌之外，還有做人的典型；他整個的生命固然在宇宙的時空系統中有他的真實性，而他生命留下來的功績，更可以長期留傳下去，不斷的發生放射性的放射作用，波動和蘊積成爲絕大的影響。而人格對於整個生命發生的聯繫和連續作用，尤爲巨大。生命的價值也靠他衡量。說到人格維持生命的連續，使我不能不提到一個不可磨滅

的故事，來作說明。當明末松山之役敗後，洪承疇也經過一個不屈時期而後降清，嗣受清廷的重用，任爲經略。後來黃道周在安徽兵敗被俘，絕食七天不死，解到江寧。洪與黃爲同鄉，想保全他的生命。「使人來言曰：『公毋自苦，吾將保公不死。』」公罵曰：『承疇之死也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躬親祭之，焉得尙存？』」至今黃道周雖死而他的人格尙放光芒，洪承疇降後雖然偷生，但當時他有價值的生命已經中斷，因爲他早把自己的人格毀了！

當然人格是道德的名詞，須知價值也是道德的名詞。哲學裏全部的價值論，就帶著道德的含義。儘管有人不喜歡他，要否定他，可是毀滅了他，則整個的人類也隨之毀滅，人類的生命也同歸於盡。這世界祇有讓禽獸和昆蟲來往，自不必再有人生哲學了！

轉移風氣民心所繫

要發揮新人生觀以創造新生命、新秩序，必須要先創造一種新的空氣，這就要靠開風氣之先，和轉移一世風氣的人。社會的演進，本不是靠多數沉溺於現在的溺溺的人去振拔的，而是靠少數特立獨行出類拔萃的人去超度的。後一種的人對於這種遭大投艱的工作，不祇是要用思想去領導，而且要以實行的榜樣去領導。看遍歷史，都是這樣；所尊孔、墨乃是力行的先哲。明季的顏習齋李恕谷一般人更主張極端的力行。就拿近代的

曾國藩來說，他幫清廷來平太平天國，我們並不贊成；但是當吏偷民情，政治社會腐敗達於極點的時候，他能轉移一時風氣，化亂世而致小康，也頗有人所難能的地方。他批評當時的吏治是：「大率以畏葸爲慎，以委靡爲恭。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畏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所以當時到了「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的局面。他論當時的軍事，引鄭公子突的話，說是「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輕而不整，貪而不親。」他感慨當時的世道人心是「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唯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殊堪浩嘆。」他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以爲是一個很謹慎的人，反之他是一個很聰明而很有才氣的人，不過他硬把他的聰明才氣內斂，成爲一種堅韌的毅力，而表面看過去，像是一個忠厚長者。他憑藉羅澤南在湖南講學的一個底子，又憑自己躬行實踐號召的力量，結合一班湖南的書生，居然能轉移風氣，克定大難，爲滿清延長了幾十年生命。

（他轉移軍隊風氣的一個例子，很值得注意。他不是說當時軍隊「敗不相救」嗎？他以「千里相救」爲湘軍「家法」，所以常常打勝仗。）一個曾國藩在專制政體的舊觀念之下，還能以躬行實踐，號召一時，何況我們具有新的哲學深信，當著這國家民族生存戰爭的重大關頭？

在這偉大的時代，也是顛簸最劇烈的時代，確定新的人生觀，實現新的生活方式，是最迫切而重要的事。方東美先生說：「中國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難，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培養博博沉雄的情緒，促我們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們抵死推敲生命意義，確定生命價值，使我們腳跟站得住。」當拿破崙戰爭時代，德國的哲學家菲希特（Fichte）講學，發表告德意志民族一書，也是這個意思。現在有如孤舟在大海一樣，雖然黑雲四佈，風浪掀天，船身搖動，船上的人衣服透濕，痛苦不堪；祇要我們在舵樓上腳跟站穩，望著前面燈塔的光明，沉著的英勇的鼓著時代的巨輪前進，終能平安的扁舟穩渡。這一點小小的惡作劇，不過是大海航程中應有的風波！

貳、學問與智慧

學問智慧融會貫通

學問 (Learning) 與智慧 (wisdom)，有顯然的區別。學問是知識的聚集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是一種滋養人生的原料，而智慧卻是陶冶這原料的鎔爐。學問好比是鐵，而智慧是鍊鋼的電火。學問是寸積銖累而來的，常是各有疆域獨自爲政的。他可吸收人生的興趣，但是他本身卻是人生的工具。智慧是一種透視、一種反思、一種遠瞻；他是人生含蘊的一種放射性；他是從人生

深處發出來的，同時他可以燭照人生的前途。有人以為學問就是智慧，其實有學問的人，何曾都有智慧？世界上有不少學問淵博的人，而食古不化，食今亦不化，不知融會貫通，舉一不能反三，終身都跳不出書本的圈子，實在說不上智慧二字。這種人西洋便叫做「有學問的笨伯」(a learned fool)，在中國便可稱為「兩腳書櫥」或「冬烘先生」。反過來說，有智慧的人也不見得都有很好的學問。有一種人，讀書雖然不多，但他對於人情事理，都很通達，憑藉經驗，運用心得，「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這種人，你能說他沒有智慧嗎？

學問是不能離開智慧的：沒有智慧的學問，便是死的學問。有許多人從事研究工作，搜集了很多材料，但往往吃乾窮年，找不到問題的中心，得不到任何的結果，縱有結果，亦復無關宏旨——這便是由於沒有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則不然，他縱然研究一個極小的問題，但卻能探驪得珠，找到核心所在；其問題雖小，而其映射的範圍，卻往往甚大。

譬如孟德爾(Mendel)研究豆子的交配，居然悟出遺傳的定律，奠定了遺傳學和優生學的基礎，就是一個例子。再說進化論的創立者達爾文。在達爾文以前，何曾沒有富於學問的生物學家，看見過海邊的蚌殼，山

中的化石，類人的猩猩，初民的種族？何以不能發明物競天擇，最適者存的天演公例？等達爾文發明以後，於是赫胥黎慨然嘆曰：「這個道理，傻子都應該知道，為什麼我此前不知道？」於是他奮身而為達爾文的「牛頭狗」(bulldog)，為他張目。當代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有人稱他為牛頓後第一人。他的相對論是科學裡一個稀有的創獲。但是他自己卻對人說：「我的發明其實很簡單，祇是你們不看見罷了！」他能看見別人所看不見的，便是他的智慧過人之處。

讀書得間智慧漸進

世間不但有缺乏智慧的人，而且也有缺少智慧的書。我們可以把書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智慧的，一類是無智慧的。有智慧的書，是每字每句，都和珠玉似的晶瑩，斧鑿般的犀銳，可以啟發人的心靈，開闢人的思想，有時可以引伸成一篇文章，或成一本專書。這就是英文中所謂「燦爛的書」(brilliant book)。無智慧的書，往往材料堆積得和蟻邱一樣，議論雖多，見解毫無。縱然可以從他得報道，卻不可以從他得啟示，在著者是「博而寡約」，在讀者是「勞而無功」。這就是英文中所謂「晦塞的書」(dull book)。然而這類的書多極了，讀者要不浪費時間，就不能不精為選擇。須知著書固要智慧，讀書也要智慧。「讀書得間」，就是智慧

的表現。「鞭辟入裏」，「豁然貫通」，都

不是容易的事。若是像誦誦高頭講章的讀法，則雖「讀破五車」，有何用處？

學問固然不能離開智慧，同時智慧也不能離開學問。有學問的人，雖然不一定就有智慧，正和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有很深的學問一樣，但是智慧卻必須以學問做基礎，才靠得住。戴東原說：「且一以自然為宗而廢學問，其心之知覺有止，不復日益，差謬之多，不求不思，終其身而自尊大，是以聖賢惡其害道也」，正是這個道理。

無學問的智慧，只是浮光掠影，瞬起瞬滅的。好像肥皂泡一樣，儘管可以五光十色，但是一觸即破。唯有從學問中產生出來的智慧，才不是浮光，而是探照燈，可以透過雲層，照射到青空的境地。唯有從學問中鍛鍊出來的智慧，才不是幻滅的肥皂泡；永遠像珍珠泉的泉水一般，一串串不斷的從水底湧。也唯有這種有根底的智慧，才最靠得住，最為精澈，最可寶貴。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若把學問譬作建築材料，那智慧便是建築師的匠心。有木、有石、甚至有水泥鋼骨，決不能成為房子；就是懂得材料力學、結構原理，也祇可以造成普通應用的房子，而決不能造成莊嚴壯麗的羅馬聖彼得(S. Peter's)或巴黎聖母(Notre Dame)教堂。這種絕代的美術作品，是要靠藝術家的匠心的。但是材料愈能應手，匠心愈能發揮；構造的原

理愈進步，藝術家愈能推陳出新。材料與技術對於作風的影響，整個的美術史，尤其是建築史，都可以證明。所以學問與智慧是相輔為用，缺一不可的。我們不但需要學問，而且更需要智慧——需要以智慧去籠罩學問、透視學問、運用學問。

學問應如何去尋求？智慧又如何去濬瀹？更應如何以智慧去籠罩、透視、並運用學問？這是思想方法的問題。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有嚴格紀律的一種意識的訓練。思想當然不是別人所教得來的；沒有思想的人，別人不能強他有思想，正如西洋古語所說：「你能引馬就水，但不能教馬喝水」(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t make him drink)。然而思想是可以啓發的。教育的最大功用，就是啓發人的思想。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就是承認思想有啓發的可能。思想應如何去啓發呢？當然非有訓練思想的方法不可。我現在先提出中西兩大哲人關於訓練思想的指示來。

中國的孔子講學問，曾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個戒條。無論經學家如何詮釋，我們拏近代思想方法眼光來看，可以得到一種新的領悟。毋意可以釋作不可凡事以意為之。沒有根據先有論斷是要不得的。這就是成見 (Prejudice)，成見與科學探討的精神不相容。毋必是不可武斷 (dogmatic)。武斷是虛心的反面，往往以不完備的知識，不合的見解，據為定論。毋固是不可固

執 (obstinate)，拘泥膠著，拒絕新的事物、新的假定。墮入樊籠而不自解，鑽牛角尖裡而不自拔。毋我是不可以自己為中心，以自我為出發點 (ego-centric predicament)。妄自尊大，正是所謂我執。這種胸有所蔽的看法，在邏輯上不能允許，在認識論上也不能容。必須破除以上各蔽，乃能清明在躬，洞燭萬象。必須如此，才能濬瀹智慧。必須如此，才能役萬物而不為萬物所役。為學求知應當如此，就是人生修養，也應當如此。

四種偶像思想錯誤

近代西洋的大思想家培根 (Francis Bacon) 在他所著的學問的進展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一書中，討論思想錯誤的原因，可說精闢極了。康第拉 (Condillac) 曾說：「世人了解思想錯誤的原因者，莫過於培根。」培根以為人類思想的錯誤，乃是由於有四種偶像 (idols)。這種偶像，佛家稱為「執」，我們稱為「蔽」。

第一是「部落的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可稱「觀感之蔽」。就是說對於一個問題，先按照自己的意見決定好了，然後才去尋找經驗，再把經驗團捏揉搓得和自己的意思相合。這無異手提著一個蠟人再向他問路。這是一般人最易犯的錯誤。現在有些大學生做論文，往往先有了結論，然後去找材料，好像藥店裡打好了裝藥的抽屜，安放得整齊齊，再待把藥材分別填塞進去，就算完

事。他不是從材料裡去逐步尋求真理，乃是把他的所謂真理去配合材料。這種工作，是白費的。

第二是「山洞的偶像」(idols of the cave)，可稱「自我之蔽」。這與個人性格有關係。每個人因為他性之所近，常常在意識裡形成他的一個所謂「洞」或「窠」。這種「洞」或「窠」，常把自然的光線屈折或遮蔽了，於是一個人就像帶上顏色眼鏡；帶了藍色眼鏡，便說一切是藍；帶了黑色眼鏡，便說一切是黑。結果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這種「洞」，人的思想一跌進去，便是不容易爬出來的。

第三是「市場的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place)，可稱「語言之蔽」。這是從人與人的接觸之中而生的。人與人相接觸時，不得不用語言來交換意思，但語言所用的字句，常以群眾所了解者為準，所以字意常不確定，或不完備，而真理遂被淹沒。人類思想的錯誤，很多是由此而來。邏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確定每個字的意義，而使其有一定的內容，以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政治煽動家說的話，大都是極漂亮而動聽的，但是仔細分析起來，有幾句是確定可靠的？莊子說：「言隱於榮華」，其實這種語言是和無花果樹一樣，以他的葉子隱蓋著他無花的羞辱。

第四是「戲院的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可稱「學統之蔽」。人類有些思想上

的錯誤，是由於傳統的信條或對事實錯誤的證明而來。古今以來各種派別的哲學系統，往往不啻是戲臺上一幕一幕的戲劇，各人憑其主觀的想像而編成的。如果有人墮入彀中，深信不疑，便很容易固執偏見，抹煞其他。中國過去的學派之爭，如所謂朱陸異同的聚訟，都於不知不覺中犯了這個毛病。

去蔽分析大澈大悟

我們根據這兩位哲人的指示，就可知道要訓練思想，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是去蔽。去蔽是訓練思想的第一先決條件。必須能夠去蔽，然後才能透視一切，大澈大悟，達到智慧最高的境界。必須去掉孔子的所謂「意」「必」「固」「我」，必須去掉培根的所謂四種偶像，然後才可虛明豁達的心胸，接受一切的真理。否則陰翳在心，障礙在目，欲求真理，真理愈遠。荀子有解蔽篇，說得很痛快。他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然則虛也者謂母若數子之蔽於所已臧之一隅，而害所將受之道也。」我們要知道智慧所燭照的，決不僅是道之一隅！

第二是分析。分析可分兩部分講：一是事物的分析。宇宙的萬象，交互錯綜，複雜

極了，要全部加以研究，自為事實所不許可。所以生物學家祇抽出一部分有生命的現象來研究。地質學家祇抽出一部分無生命的現象來研究。這便是以類別來分析的辦法。二是觀念的分析。譬如語言文字所包含的意義，若要論事窮理便非先弄清楚不可。不然，就生許多誤解，許多枝節，許多爭論。哲學爭論之中，尤多文字涵義之爭。從前黃遠生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籠統為國民之公敵。這「籠統」二字，是中國人思想上最大的病根，不知誤了我們多少事。我們要國民有清晰的思想，非把許多語言文字裡所包含的觀念，先行「刮垢磨光」一番不可。

見樹木亦須見森林

第三是綜合。綜合就是將分析所得的結果，組織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綜合的最大目的，就是在求思想的經濟（economy of thought）。科學的公式，必須能以簡馭繁，就是把最簡單的公式，解釋和駕馭許多繁複的現象。無綜合頭腦的人常覺得宇宙間的萬事萬物，不是各不相關，就是紊絲一團；而在有綜合頭腦的人看來，則覺得處處關連，頭頭是道，可以從中找出一個整齊的頭緒，美麗的系統。

第四是遠瞻。講藝術要注意遠景，講科學何獨不然？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因為研究專門的東西，最容易囿於一個狹小的範圍，而把大者遠者反遺忘了。專家的定義是「一

個人在最小的範圍以內，知道最多的東西。」所以專靠專家來謀國，是可以誤大事的。蔣百里先生在他的「日本人」中，形容日本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的情形，有一段話最足發人深省。

他說：「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國情形，有許多秘密的知識，比外國人自己還要豐富。但正因過於細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記了。譬如日本人研究印度，比任何國人都詳細，他很羨慕英國的獲得印度，但他忘記了英國人對印度的統治，是在大家沒有注意時代用三百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卻想在列強之下三十年內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國個人人物。他們的傳記與行動，他很有興會的記得，但他忘記了中國地理的統一性與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來改變五千年歷史的力量，將中國分裂，他又羨慕新興的意大利與德國，開口統制，閉口法西斯，但他忘記了他無從產生一個首領。」

這一段話，我不厭其詳的寫下來，是因為他不但給日本人一頓嚴厲的教訓，也有可供我們深思之處。我們所理想的科學家與思想家，不應鑽進牛角尖裡，而應站在瞭望臺上！

追求智慧一生以之

以上四點，都是值得每個研究社會或自然科學的人加以深切注意的。黃黎洲說：「無速見之慧」，智慧是要努力才能滄論的，

我們更努力求學問，我們更努力求智慧！唐人高駢有一首詩道：「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這是一首很有哲學意味的詩。哲學最早的定義，就是「愛智」，也就是對於智慧的追求 (pursuit of wisdom)。他對於宇宙和人生是要看整個的，不是看局部的；對於歷史是要看全體的，不是看片段的

。一時的便宜，可以釀成終久的吃虧。窮兵黷武的野心家可以造成無數戰場的勝利，而最後得到的是整個戰局的失敗。這是缺少智慧的結果。現在的世界，學問是進步了，專門的知識是豐富了，但是還有這種悲痛、殘酷、黑暗、毀滅的偉大悲劇，表演出來，這正是因為人類智慧貧乏的緣故！想挽救人類出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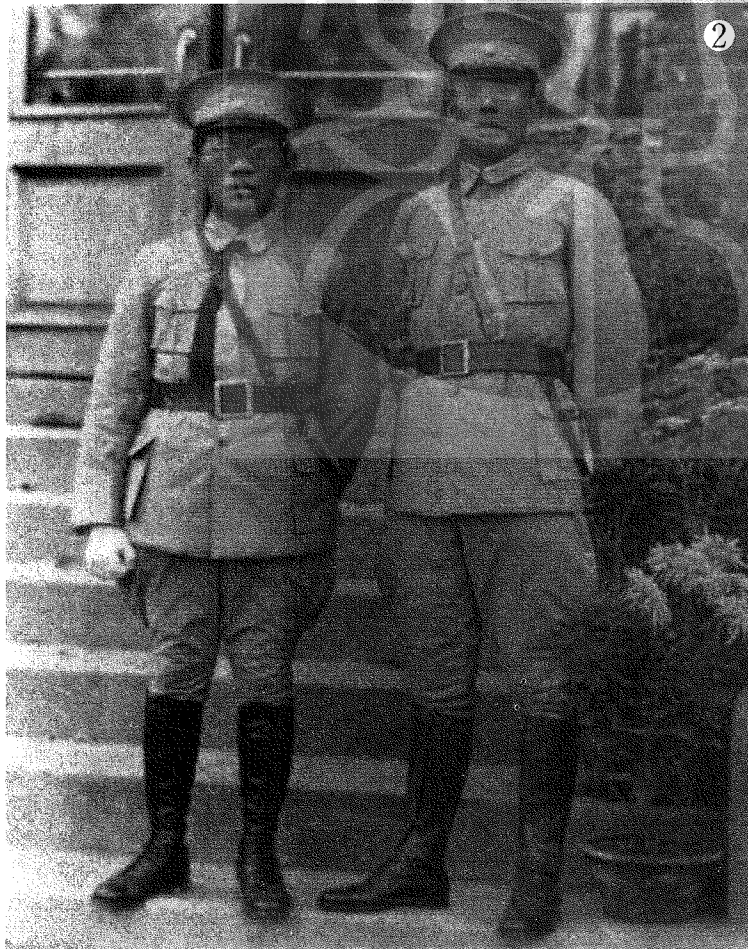
浩劫的人，在這陰翳重重的世界裡面，祇有運用慧劍，才能斬除卑狹私偽，驕妄怨毒，塞心蔽性的孽障，才能得到長久的和平。希伯來古語說得好：「快樂的是能尋著智慧的人，是能得著了解的人。」(Happy is the man that findeth wisdom, and the man that getteth understanding. Proverbs.) (標題為編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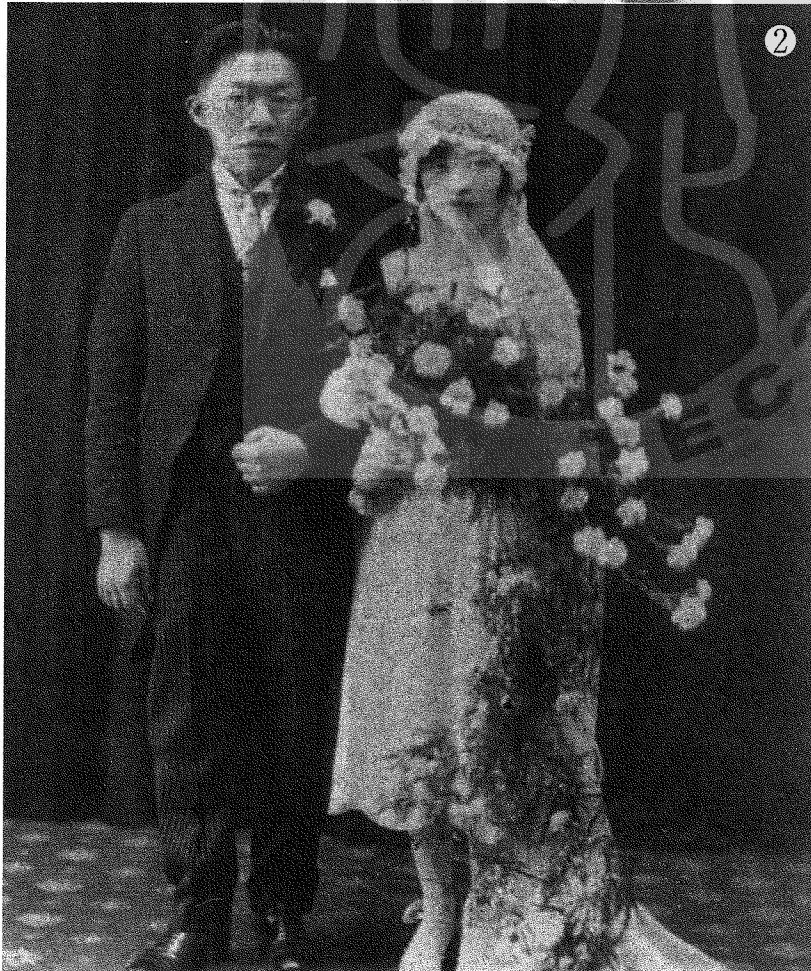
① 羅家倫 (右一) 1959 年接待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夫婦 (右二、左) 參觀荔園史庫留影。

② 羅家倫 (右二) 與大專院校文史教授參觀草屯史庫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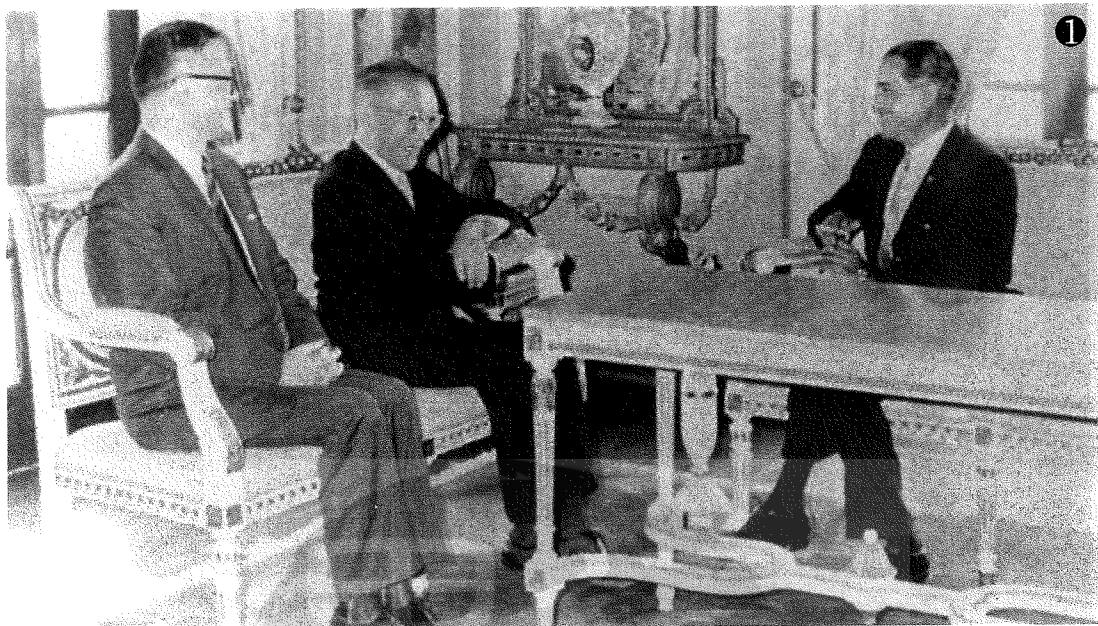




①羅家倫（前右四）任清華大學校長時與梅貽琦（前右三）等合影。
②羅家倫（左）一九二七年任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時與同僚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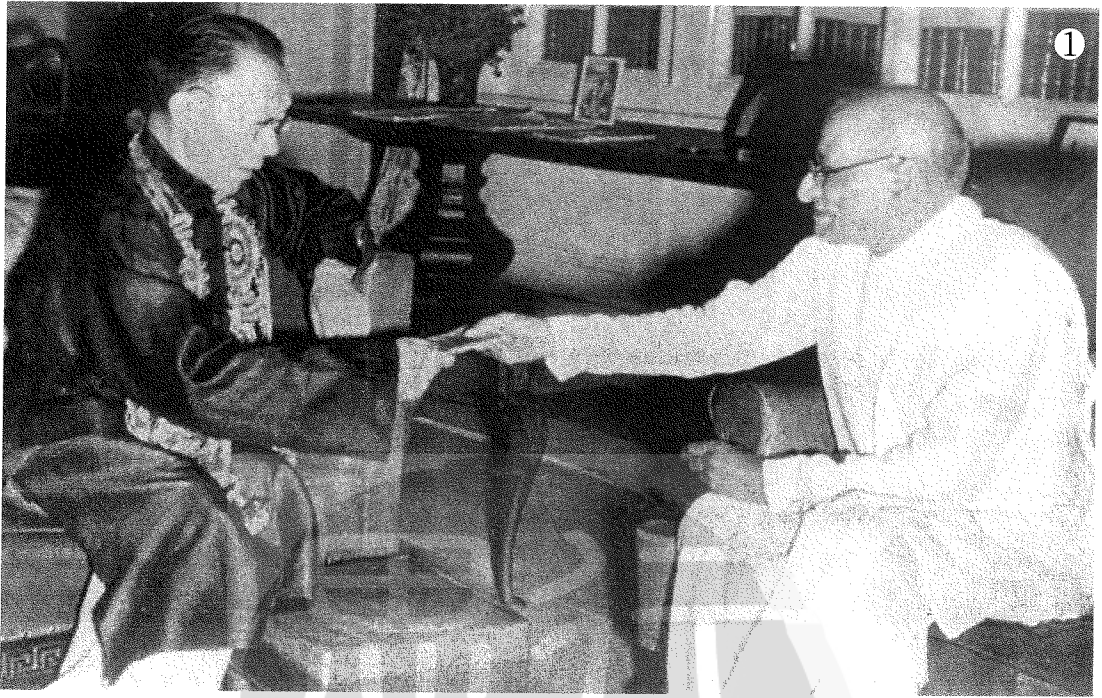
①羅家倫（中）任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時與盛世才（左）凌鴻勳（右）合影。
②一九二七年羅家倫（左）與夫人張維楨（右）結婚時合影。



① 羅家倫（中）1960年與巴拿馬總統拉瓜地亞（右）晤談時留影，左為馬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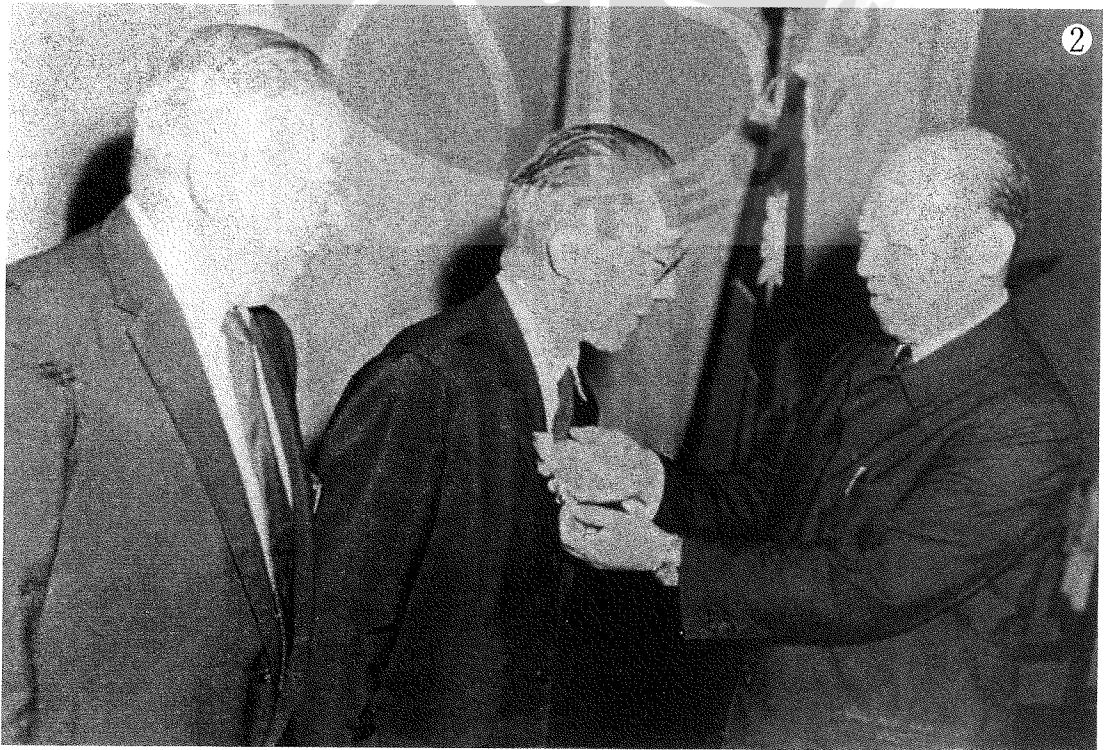
② 羅家倫（前右二）與王世杰（前左二）杭立武（前右一）等早年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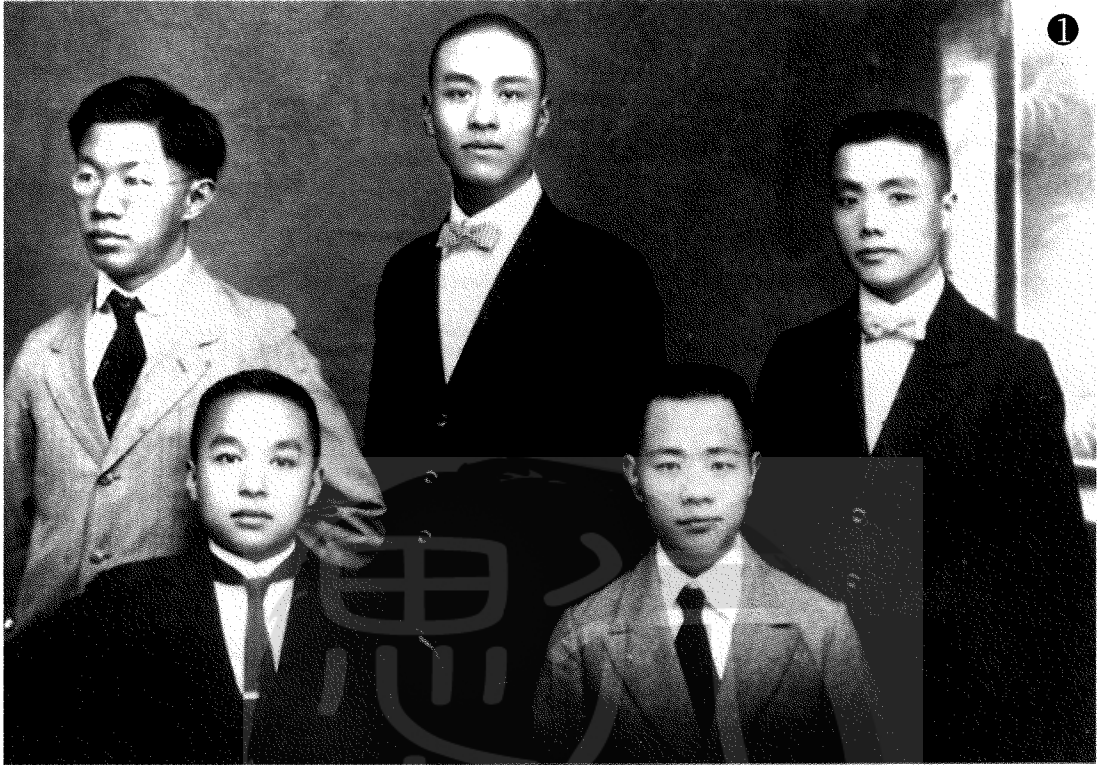


①羅家倫（左）任駐印度大使時與印度總督 Rajagopalachari 合影。

②羅家倫（中）1962年接受韓國外長崔德星（右）代表韓國政府頒贈的文化優功勳章。



羅家倫：「歷久彌新的生命探照燈」插圖（文見一一三頁）



①



②

① 羅家倫（後左）一九二〇年與北大同學合影，前排左起：康白情、汪敬熙，後排右周炳琳、中段錫朋。

② 羅家倫晚年在寓所留影。